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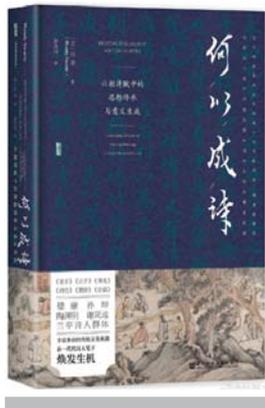
六朝山水诗何以流传

□禾刀

这是一个注定会被载入文化史册的盛会：公元353年三月初三，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举办了一场春禊集会，包括谢安、谢万、孙绰等41位诗坛文人齐聚茂林修竹，流觞曲水，纵酒狂诗，畅叙幽情。王羲之曾以一首324字的《兰亭集序》，记录了这一文坛盛况。有研究者视此为“山水玄言诗在东晋兴盛的一大旁证”。然而，衣冠南渡，梦牵故土，面对纷乱，寄情虚幻的山水玄言诗，是六朝文人为郁积情绪寻找宣泄出口的不多选择之一。

在唐宋诗词盛极的前夜，面对最混乱的时代现实，六朝文人阶层以一套独特的、镶嵌式的方式参与了文化传承，生产了呈指数级增长的文化财富。《何以成诗：六朝诗赋中的思想传承与意义生成》一书中，美国罗格斯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田菱，借助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考察典故与引文，对嵇康、孙绰、陶渊明等人的诗赋作品展开细读，探讨了它们与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周易》，乃至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论语》等传统文化典籍之间的复杂关联。诗人们在哲学与文学之间落笔成诗，创造性地运用了异质多样、千变万化的文本和文化资源，展现了异彩纷呈的创作才能、思想理念与内心世界。

本书探讨的第一个人物是嵇康，在本书人物年龄序列中最长，对后来者或许存有一定的影响力。作为“竹林七贤”核心人物的嵇康，主张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田菱认为这正是“老子政治哲学”的延伸。嵇康“更为显著地利用了他所掌握的各种诗歌、哲学和文化资源”，田菱称其为拼装匠，同时指出，嵇康这种“以文本形式将文化作为对象的运用，也意味着发掘了一个社会的文化记忆”。现实中的嵇康并没有如诗中那样与生活场域完全割离，“出世守静”的清淡只是他的表象，内心还是充满挣扎。后来他因替好友出头招惹了“路人皆知”的司马昭，最终未能逃脱杀身之祸。现实的悲剧性表明，“出世守静”一旦落到生活中，往往需要直面



甲骨文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田菱 著
郭鼎玮 译
《何以成诗：六朝诗赋中的思想传承与意义生成》

太多残酷现实的煎熬。

孙绰与陶渊明是一对有趣的比较对象。孙绰被当时捧为“一时文宗”，陶渊明则像是一壶陈年老酒，直到六百年后才在宋代逐渐引人注目并一路“走红”。田菱指出，“孙绰感悟了从大自然中抽象而来的隐逸守静之美，发掘了形而上的玄理”。相较同时代诗人倡导的出世生活，孙绰的认识更显理性，他指出，“即便是那些在山林之间享受‘嘉遁’的人，也要背负起樵采为生的重担”，一个人能否真正做到超越，“不在于一个人处于怎样的物质地位（在朝为官或归隐山林），而在于他能够做到精神上的超脱，不会为情所累”。相较于嵇康的迷茫与困顿，孙绰无疑更具现实性，正所谓大隐隐于朝——只要是隐士，哪里都是隐身栖息之所。

“清淡”是玄言与山水诗的共有标签，但二者之间还是存有细微的差别。田菱认为，“山水诗以具体形象‘山水媚道’，玄言诗以抽象概念‘以理证道’；山水诗情、景、理三合一，玄言诗纯理性客观说理”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山水诗之所以得以流传千古，盖因“山水诗的文学功能符合了中国人重感性、重主观、重传统的民族心理特点”，更能从情感角度与后世读者产生共情，这显然是以推崇“以理证道”、偏虚幻近枯燥的玄言诗难以比拟的。这或可解释，为什么六百年后，陶渊明逐渐取代了

孙绰等人，成为新的山水诗人代表。

田菱认为，陶渊明借用了《庄子》甚至还有《列子》的一些思想，消化吸收后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。“陶渊明的诗学有着若干核心主题，如生死、隐逸、道德准则等”。还有，“他在生死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、令人信服的立场——死与生是等齐的，死亡不再是一种终结，而是众‘化’的其中一个”。陶渊明关于生死的表述不仅具有诗性，更饱含深厚的哲学内涵。

从历史纵深视角看，紧步六朝之后的唐宋两代，诗词歌赋迎来了大爆发期，这也是诗坛历史上少见的高光时刻。虽然唐宋两朝山水诗较六朝有所区别，但从诗风及数量看，崇尚陶渊明的更接社会地气，更易为文人所接纳，寄情山水，越来越成为文人墨客推崇的文学表达方式。

再回到1600多年前的兰亭诗会现场。田菱认为，“兰亭诸诗起到了一种平台的作用：诗人们可以阐发自己对‘道’的理解，也可以展示自己的机敏才智”。从现存玄言诗看，“绝大多数是在群体活动中创作的，或是以赠答交流形式写就的”。兰亭盛会的牵头人王羲之题写的《兰亭集序》，“在不自觉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记忆，他的诗影响着后来的中国山水诗，使兰亭诗人群体注意到一切自然界的万物都可作为审美对象，并且通过物质化大自然，使人感知‘道’的运行”。

只要是写作，就无法避免对前人文本的化用与阐释。没有化用与阐释，便没有文学，便只剩僵硬枯燥的文本。或者说，文本的传承，本就是一个吐故纳新、消化吸收后再输出的化用过程。在化用的过程中，六朝的诗坛巨匠们就像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数据，通过内在逻辑联接，形成新的哲学成果。六朝文学批评家钟嵘曾指出，“一切诗歌都滥觞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两大源头，但两晋之交新流行的说理诗风，却打破了这种源流传承”。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，正是六朝诗赋跨越秦汉的哲学化用，才为唐宋诗词歌赋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。

（作者为书评人，武汉道桥公司员工）

从女性的角度看世界

□肖平

初识《看不见的女性》这本书，是因为看到豆瓣的年度推荐书单，拿到这本书的第一反应，却是被书后几十页的注释数据所震惊——第一次看到一本书注释部分占全书页数三分之一的篇幅。当时特别想知道作者是查阅了多少资料，才完成了这样一本著作。正如英国作家珍妮特·温特森所说，“这本书没有咆哮，只有事实和数字”。

作者佩雷斯是英国作家、记者，2019年出版《看不见的女性》，获评英国书店奖最受读者欢迎好书、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、《金融时报》及麦肯锡商业图书奖等重要奖项，并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出版。在书中，佩雷斯从日常、职场、设计、医疗、公共生活、极端灾害这六个场景着手，为我们展现女性遇到的无处不在的偏见。

与以往的女性哲学相关的图书相比，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大量来自研究论文和官方报告的统计数据，并通过列举身边显而易见的事例，为读者呈现女性所遇到歧视的真实场景，更容易引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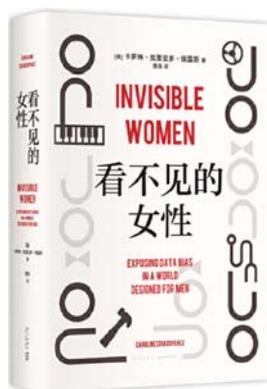
读者的共鸣。这本书虽然是在为女性发声，但是并没有强烈的女权主义色彩，而是通过收集有关女性及其生活的数据，发现女性性别数据缺口以及对女性生活、健康、职业的影响。佩雷斯希望通过这些性别数据缺口存在的现实，引发我们进行深入思考：我们似乎根本看不到对于女性的歧视，或者说，我们看不见它，正是因为我们把它正当化了——它太明显、太普通、太司空见惯，因此已经不值得我们再对此作任何评论了。

因此，《看不见的女性》这本书适合所有的女性读者，作者提到，“作为女性最有讽刺意味的是：当我们被当作从属的性别阶级时，却会变得过度显眼；而在需要被重视、计入总数时，我们又被视而不见”。如果女性习惯于歧视场景的存在，将所有的成功都归功于男性的努力，那女性的地位将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，这不仅对女性是不公平的，对家庭和社会也是不利的。所以，女性要让社会看到自己的努力和付出，改变传统的以男性为主体的认知习惯。

当然，这本书更适合所有的男性读者，从男性的角度来看，习惯从男性的认知看待世界，《看不见的女性》中女性的视角可能会让男性读者感到困惑——在已经熟悉的认知领域，女性为什么会把已经普遍性的观点，看成是对她们的一种歧视或者说是忽视。书中对于女性在工作、生活中面临问题的描述，可以帮助男性更好地理解自己身边的女性，改变以往特定的经验和看法，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对女性产生偏见。

总之，《看不见的女性》是一本可以细细品读书，这本书会让人重新审视女性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，更好地理解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和需求，也为我们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视角和方法。正如书中数学教授泰米娜的故事所表明的，回到弗洛伊德的“女性特征之谜”，答案一直就在我们眼前。“人们”所要做的，仅仅是——向女性提问。

（作者为天津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员）



《看不见的女性》
[英]卡罗琳·克里亚多·佩雷斯 著
詹涓 译
新经典文化·新星出版社

纪念文集编纂的新范式

□吴善松

1939年7月，顾廷龙赴上海，撰写了《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》，提出“专为前贤行役，不为个人张本”。2024年是顾廷龙诞辰120周年，《为前贤行役：顾廷龙诞辰120周年纪念文集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为前贤行役》”）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，以“为前贤行役”为名，正是顾廷龙先生“为前贤行役”精神的传承。《为前贤行役》共82万字，收录文章45篇，随处可见编者与作者之用心，堪称纪念文集编纂的新范式。

《为前贤行役》按照“事一人一书”的结构编排，分为《事业篇》《交游篇》《著述篇》三部分，从不同角度和层次，全面展现了我国著名版本目录学家、图书馆事业家和书法家顾廷龙先生的人生和学术，表达了深切缅怀与追思。《事业篇》收录文章10篇，回顾了顾廷龙的一生，凸显他在图书馆事业、古籍文物保护和书法艺术等方面的贡献；《交游篇》收录文章23篇，全面而深入地展示了顾廷龙与同道的交往；《著述篇》收录文章12篇，论述顾廷龙主要著作的成书、出版与价值，彰显了顾廷龙在经学、小学、版本目录学、金石学等领域的学术贡献。书后还附有《顾廷龙著述目录》和《顾廷龙研究论著目录》，不仅搜集较为全面，而且纠正之前某些著录的错误，更便于学界研究利用。

《为前贤行役》不仅哀辑旧作，而且撰写新篇。该书所选旧作均具有厚重的学术含量，如王绍曾《〈顾廷龙文集〉序》、沈津



顾廷龙诞辰120周年纪念文集
何朝晖 编
《为前贤行役》
山东友谊出版社

《顾廷龙与合众图书馆》、杜泽逊《顾廷龙先生与〈四库存目〉研究》等，纯粹的回忆性、杂感类文章不收。顾廷龙交游广泛，但目前学界对此研究较薄弱，所以该书自出机杼，专设《交游篇》。《交游篇》中的文章利用大量新材料，发前人所未发，关注顾廷龙交游的具体细节与互动，全面、系统而深入地展示了顾廷龙的交游，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上世纪学术界的真实面貌。顾廷龙与某些学人的交游属首次深度揭示，如《顾廷龙与朱士嘉的交往及应邀赴美钩沉》梳理了顾、朱二人交往近60年的友谊，补充了当前学人对禹贡学会的研究。《顾廷龙与胡道静学术情谊述略》揭示了二人志同道合、相知相惜的深厚情谊，顾廷龙对胡道静《梦溪笔谈校证》的出版、古农书的整理与研究等提供帮助，胡道静也帮助

顾廷龙解决了《中国丛书综录》编纂出版过程中的一系列难题。前人已有研究的顾廷龙部分交游活动，则进一步挖掘和拓展相关史料，将研究推向深入。如《顾廷龙与胡适交往考论》《顾廷龙与潘景郑交往考述》等文章补齐了某些被前人忽视的细节，同时也发掘出部分鲜为人知的史实。

该书部分新撰写的文章，不仅充分利用了已出版的《顾廷龙文集》《顾廷龙全集》《顾廷龙日记》等文献，还使用了大量新材料，特别是沈津先生的《顾廷龙年谱长编》未刊稿（现已由中华书局出版），其中部分书信、笔记、履历表等不见于《全集》，又有部分材料搜集自多种图书、杂志、报纸、档案。《顾廷龙与钱存训交往考略》《顾廷龙与张秀民交往钩沉》等文章均充分利用了这些材料，不仅对顾廷龙与这两位著名学者的交往作了深入揭示，对钱存训、张秀民研究也具有推动意义。

正如顾廷龙先生的弟子、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原所长严佐之教授所说，《为前贤行役》是第一部专门研究顾廷龙学术成就、学术思想的著作，标志着学界对顾廷龙从感性怀念到理性研究的转变。该书兼具缅怀意义和学术价值，不仅是对顾廷龙先生诞辰120周年的纪念，也是对当今学界顾廷龙研究最新成果的展示。顾廷龙先生及其同辈学人的学术思想和事业精神，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，也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研究。

（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）